

哦，你是我的父亲

Qian Liqun

钱理群 著

# 我的家庭回忆录



美丽寂寞的身影

这也是一种坚韧和伟大

哭好哥

心系黄河

龚姐，一路走好

无以表达的悔恨

四哥走了

漓江出版社

K825.6=7  
201439

阅 购

钱理群著

# 我的家庭回忆录



漓江出版社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家庭回忆录 / 钱理群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07-6827-0

I. ①我… II. ①钱… III. ①钱理群—回忆录 IV. ①K825.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9949 号

策 划: 郑纳新

责任编辑: 张玉琴 刘树勇

装帧设计: 李星星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 253000)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18)

##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代前言)

书桌上放着一本《钱天鹤文集》。

这是我编的书,为我父亲编的书。

这是一位“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半个世纪(1916—1958)思考的结晶。

但早就被遗忘了——父亲被儿女们遗忘了,先驱者被研究者遗忘了。

随着从尘封的报刊里,一篇篇文章被发掘出来,父亲的形象由模糊逐渐清晰,先驱者的业绩从陌生人中日见显现,我就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屡见不鲜?……同时涌上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面对遗忘,我应该作怎样的精神的承担?……我常常为此而惶惑不安,既渴望着出书——如我的一位哥哥所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赎罪;却又恐惧于出书——它的每一页都将展示我的被扭曲的灵魂与狭窄的学术眼光,使我无地自容,无论作为人之子或者学者……

书终于出版;而我,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它吗?有足够的力量思

考它吗？

政治家们、历史家们经常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在各个场合谈论 20 世纪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理会这分分合合的历史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里的问题的：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

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最近，因为姐夫的去世，我又多次想起国共两党的分裂在我们家庭的反映：父亲与一个哥哥选择了国民党，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那正是国共二次合作时期）还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副部长），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先后达 15 年之久。而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二姐夫和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与地下党员。在作为家庭中的小弟弟、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我，特别是作为这段历史的研究者的我的立场上看来，这正是反映了国共两党分裂的深刻性：它一直影响到家庭成员内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而对父兄们的不同选择，我则怀有同样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也认为他们各自都有应该正视与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我也要坦白地承认，我对家庭中的几位老共产党员怀有更多的敬意，尽管（或者说是正因为）今天人们对他们当年的选择有着种种的议论。我所敬佩的是，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作出独立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的,这在当时意味着: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不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意味着对父兄所选择的道路的一种反叛,而不能不承受中国传统的无违为孝的道德观念的强大压力。在这个方面,我的共产党员的兄长们是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五四”伦理变革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根本改变了子女对父辈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个人独立选择自己的理想、信念与人生道路的自由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同一个家庭(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的成员,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于在思想、信念上,行动上发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还会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处理这不同的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统治者变成了流亡者,反叛者成了掌权者。这自然会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命运产生影响。父亲与二哥到了海峡那一岸,身处逆境中仍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努力发展各自的事业,父亲作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对台湾与金门农业的振兴贡献尤大,金门民众为他建有纪念碑。但他们都长期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父亲于1960年退休,1972年在孤寂中离世。二哥虽于80年代几度回大陆,但也因身心付出太多,而于1990年病逝。

而大陆这一边所发生的事,则耐人寻味。

首先是胜利者宣布,被赶下台的国民党政府为非法,国民党为反动政党——这在当时几乎是顺理成章,并为新政权的立足所必

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深远而严重的。以此反观现代历史、国民党的历史，特别是它单独执政时期的历史，例如 1928—1937 年的历史，就成了罪恶的堆砌，黑暗的深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一切发展都不存在了（仿佛不予承认就是不存在），中国从 19 世纪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也因此而中断了，如果有所成绩与进步也只存在于反叛者这一边。盛行一时的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有不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的的努力，例如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的道路，以及相应的贡献，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并且“在客观上是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因而“本质上是反动的”，至少是无可取的。但这却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直到这次为父亲编选文集，我才知道，从 20 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立志“科技兴农”，称为“农业派”，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兴办农业教育（父亲即是在海峡两岸农学界极有影响的金陵大学蚕桑系的创办人之一），开展农业科学的研究（中国第一个中央农业研究所即为父亲创建），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于是有一部分农业专家转而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父亲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主持全国农业领导工作时，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全局的意见，例如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提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业商品化”的道路，必须以农民的实际经济收入的提高作为发展农业的目的，提出农业生产与农业教育、科研、工业、商业、运输、贸易、金融……统筹安排的设想等等。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这也是不

能忽视与无须掩饰的事实)与其他原因,这些思想未能全面实现,却不应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农业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我们建国后在农业发展中所走的许多弯路,与将这些在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曾提出过的有价值的思想、设想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思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遗产”而拒绝研究,拒绝吸收、借鉴,将其强迫遗忘,是直接有关的。今天,大概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吧。但影响似乎依然存在,比如至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文化、科学、社会的发展仍是有关历史(通史与专史)的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些年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失误的反省,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又变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理想化,这其实依然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在起作用,尽管看起来好像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科学地研究国共两党分别执政时期的历史,仍是当前中国现代史(通史与专史)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此相关又有区别的是对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在探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时,始终存在一个盲点,即是对自然科学家的忽略与排斥。这或许与前文所说的长期将自然科学家列入“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范畴有关。在思想深处说不定还没有完全摆脱忽视自然科学的传统观念。其实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留美学生就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父亲是第一批会员与骨干),高举起了“科学”的旗帜,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自由集合体,他们创办的《科学》杂志是最早实行横排,并使用新式标点

的，与成立于其后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是相互配合的。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学家、人文学者同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着共同的目标，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情感、心理……)，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又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忽略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我们的研究视野的极大局限。

新中国成立后的问题并不只是前述历史观、历史评价上的偏颇，而直接引申出对人的处理，从而涉及人的命运、家庭关系、人的情感世界与伦理道德。既然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一个罪恶的渊薮，那么，不用说这个党与政府的成员(哪怕是最普通的成员)，从此背上了卸不掉的罪恶的历史包袱，就是与它有牵连者，也有了罪的嫌疑。甚至我的哥哥姐姐，当年勇敢地作出了与父亲不同选择的革命者，竟在自己的队伍里被视为异己，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中，父亲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就是必然的。据说作为子女的我们，还是“有出路”的，条件就是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什么叫“划清界限”？就是从灵魂深处，把血肉相连的父亲形象挖去，把最后一点亲情也要遗忘殆尽，换上一个外加的“反革命”恶魔的身影，从而将爱转化为恨，自动地向父亲泼脏水。这无疑是一种强迫，因为划不清界限本身就有被划出人民的圈子，成为专政对象的危险。

但还要将强迫变成自愿：制造出种种理论，把划清界限崇高化，从而在伦理上跨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子女摆脱了长者本位伦理观的约束，从而获

得了独立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权利,但鲁迅又再三强调不能因此而否认人伦的天性的爱,也即“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是一条底线。如果不止于作出不同于父辈的选择,而且进一步视父亲为仇敌,从精神以至肉体上伤害自己的亲人,那就过了线。在我看来,即使像某些戏剧中表现的那样,父子之间忠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也不能由一方(父或子)杀害或伤害另一方(父或子),至少是应该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是因为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天性的爱是离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是绝对的,同样是不能让步的;这是一条人、禽(兽)之界,过了这条界线,人就不成为人,或者说其内在的兽性被诱发出来,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异化。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可以任意伤害、甚至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那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呢?这是一个危险的让步,一开了头,就由不得自己,按照其自身的逻辑,顺流而下,是会引出十分可怕的结果的。——今日反思及此,想到当年如何急于和父兄划清界限,伤害自己的亲人,真的又出了一身冷汗!特别是想到长期以来,竟把这类违背人的天性的行为美化为“为革命牺牲”、“大义灭亲”(?),更是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鲁迅早就说过,真正的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更毋论要灭亲!这里也是隐含着一种道德观、伦理观的,即是“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干;“崇高”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这样的为一切罪恶、反人性的行为开路的伦理哲学,竟在

我们社会里打着革命的旗号风行一时,至今仍有影响。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深思么?

看来,我们在回顾、总结历史时,最需要追问的,正是长期支配我们行为背后的基本观念,历史观,伦理观,等等。面对这样的对前提的质疑,需要的是正视的勇气、理论的彻底性,而绝不能遗忘与回避。

这或许是我编辑《钱天鹤文集》一书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

1998年3月22日写毕于燕北园

# 目录

mulu

## 辑一 太晚的纪念

太晚的纪念——《钱天鹤文集》编后记	3
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一代人——在项兰生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	6
哦,你是我的父亲	10
中国现代农业界的先驱	16
这也是一种坚韧和伟大——先母逝世二十周年祭	46

## 辑二 亲情永恒

亲情永恒——《钱临三纪念集》前言	53
美丽寂寞的身影——悼大姐	54
哭好哥	60
心系黄河	70
钱宁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概述	139

龚姐,一路走好 159

无以表达的悔恨——奉献于三哥灵前 165

### 辑三 永远的怀念

四哥走了 173

愿你永远是年轻的革命者——悼二姐 189

丁毅对现代民族歌剧的历史贡献 206

后记 234

## 辑一 太晚的纪念



## 太晚的纪念

——《钱天鹤文集》编后记

这是一个太晚、太晚的纪念：父亲离世已经二十三个年头，早过了百岁冥诞；我（父亲最小的儿子）也两鬓斑白。当年（1948年）全家诀别，父亲正是我这个年龄——这么说，我们父子已经隔绝整整半个世纪。

而且这不仅是地理的，更是心灵的隔绝。几十年来，我们不断地被要求“划清界限”，却终于徒劳；但我们确又是直到现在才通过搜集、整理父亲的遗作（而不是亲聆教诲）逐渐熟悉、理解了父亲，并终于贴近了那颗宽厚、仁慈的大心。我们因此而痛心疾首，悔恨交加，但也感到了巨大的欢乐和幸福——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父亲，在这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

此时此刻，我特别思念长眠于地下的母亲。她一生没有父亲这样辉煌的事业，也不曾留下任何文字，但她的形象也许是更加深刻地铭记在我们每一个子女以及下一代的心上。不仅是记着她的养育之恩，更因为她以瘦小的身躯独立支撑了一个世纪经历了两次生



在父母墓前(左为侄子钱明)

死离别的几近破碎的家庭：抗战开始，她随着父亲只带了大哥、婢娟姐、匡武哥南下重庆，并在那里生下了我，却忍痛将大姐、二姐、三哥、四哥留在上海沦陷区；四十年代末，她又忍受着与父亲，以及远在美国的大哥与三哥离别的揪心之痛，带着稚子幼女孤守家园。这“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钱氏家族大悲剧，母亲无疑是最大的承受者与牺牲者。如今，历经磨难的全家，无论生者或死者，终于获得“心的合一”，最感欣慰的应是母亲——即使没有滂沱热泪，也会露出慈爱的微笑，并依然端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

这都是历史。我们谁也负不了责任的历史，谁都不能忘记的